

暨書處服務人員所提供之可貴的與有效的服務是普遍被承認的。我們希望能從國際航空經營機關的工員得到同一品質的服務並非過份的希望。

「另一反對澳洲與紐西蘭政府所擬國際經營的理由是說它會構成過分的侵犯國家主權。因為這種經營方法能夠給予各國愛好和平人士以這樣巨大的利益，我認爲這種見解是不能維持的。在所有國家的國家管轄範圍中，限制若干公民的權利以謀全體的幸福是必要的。同樣，在國際關係上面，應當接納某一權利之限制。於以鞏固與發展全體的利益。」

外交縱橫談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安。」
戰國策蘇秦從燕之趙章

國家政治之重要行爲，對內維持秩序，對外維持安全。維持秩序固屬重要，維持安全亦不能說是比較次要。也許對外安全較對內秩序還要吃緊。即是說一個國家要是對外無生存之可能，對內怎樣秩序良好也無用處。不過，只要國內秩序良好，對外大體容易謀取生存之路徑。可是要像此次德國所侵佔之各國如捷克、丹麥、比利時等，國內秩序未嘗不好，而國家却被人所蹂躪踐踏了。

因此，立國之要，要如飛機一樣必有兩隻翅膀，這翅膀只屬於飛機的外形，主要還在於發動機。但若無翅膀或翅膀缺少一隻或一隻兩隻受了傷，發動機縱使優良也無用處。這兩隻外形的翅膀之於國家，即軍事與外交是也。

在該文之末，蘇利文氏說：「澳洲與紐西蘭計劃，在芝加哥會議中未被採納誠爲不幸……但是有前進思想的人，必須在來日繼續我們的努力，使這個計劃最後得被採納。」

在這次芝加哥會議中，美國時代週刊嘲笑中國說：「中國的代表靜悄悄坐在一隅，既沒有飛機(Planes)也沒有計劃(Plans)。」當着人家這樣處心積慮，競爭今後國際天空之際，我們除了應以「迎頭趕上」的精神，加倍努力發展我們的航空以外，還要把握住國際航空問題的癥結所在，研究與擁護基本的解決方案纔好。

姜蘊剛

一個國家要是不講究軍事與外交，這個國家便非常之危險。或者又只有軍事而無外交，或只講外交而無軍事之準備，都不容易立國。現今世界上的國家，軍事之充實準備，總無如德國與日本了，可是因外交的不講求，遂有今日之逆境。外交最靈活的運用，總算是英國人了，但以七十老翁之首相張伯倫飛去飛來之辛勞，仍只換得英吉利海峽之緊張及首相之氣死。

國家是不可無軍事與外交的。軍事與外交之最高目標都不在於造亂而在於追求和平。濟軍事之窮的正屬於外交，軍事之發生乃由於外交之失敗。外交與軍事相較，外交是主，軍事是從；外交是正軌，軍事是奇兵；外交是前鋒，軍事是後盾。兩個國家鬧到以兵戎相見，這是外交的恥辱，也是國家的損失。兩個國家的正常接觸是外交的行爲而不是軍事的發動，因此，立國之道，與其說是軍事與外交，實實在在說來，還只是外交。

外交之於國家，是幸福使者，是友誼感情的動脈，是人身呼吸機

123384 關，是耳目靈活的使用。

世界上真正的和平現象不是軍事的而是外交的；也可以說人類的真正前途，在於人類共同努力之文化的創造，而非人類互相殺害與互相排斥。

實際上，人類可憐萬分，還在共同遭受自然之危害及威脅，連普通之疾病尚無法盡行抵抗，還自相殘殺什麼！

說也可憐，所謂種族的歧視及國家間的仇恨，只不過輪番的自己諷刺自己，這有什麼先天的命定！

所以人類必追求和平。但和平之到來，惟有人類之為友情的發展方可以建立基礎，這個便屬於外交的行為。

便可以說，人類政治之最後目標，就是完成至善的外交行為。外交行為，應該成為人類政治的重心點。人類政治之發展若建設不起至善的外交基礎，人類是永遠無和平幸福之可言。

二

中國先秦時代，頗近於今天的大世界。春秋戰國之區別，一在於重視外交之運用，一在於重視軍事之推動。管仲佐齊桓公稱霸，即是「不以兵車之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之力，即在於重視外交之運用。「使隕朋為行」，行乃職掌朝覲問聘之官，今之外交部長是也。又在各國設若干駐在人物，即今之大使，並設游士八千人，都是辦外交的。所以不以兵車之力，便能九次會合諸侯，稱霸於天下了。入了戰國，便只有靠兵力以互爭雄長，所謂外交，已經是屬於駭詐行為。像蘇秦張儀之徒，縱橫捭闔，反只是促動戰事之頻繁，太史公所罵為傾危之士，真真不錯！如秦趙長平之役，坑卒四十萬，全然是不人道的行為。而今的大世界則是中國先秦之戰國時代！

話雖如此說，但聯合國終於要勝利了。四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舊金山會議便是世界和平之前夕。德日已走近末路，聯合國已在商籌戰後之和平的機構。設若說聯合國真是勝利的話，這即是外交的勝利；軸

心國之所以失敗的話，便是軍事的失敗。今次舊金山會議也屬於外交行為的方式。

關於舊金山會議的宗旨及內容，我們無暇去討論，也無討論的必要。因此種討論非根要之談，主要還在由此會議而引起我們對於外交行為的重視及意義之闡發，而希望此後世界，外交能替代軍事，外交能發揚政治之真義。因為人類要和平，和平之基本建築則在於外交。外交是兩利的事，軍事是兩害的事；外交是人性的接觸，軍事是獸性的衝突。

由獸而人，由害而利的進步，本需要歷史與文化的指示。誰不願為人而由利呢？可見現今之人就還有這樣的愚蠢，就不肯輕於取掉獸性與努力避害，正如撲燈蛾之引火自焚一樣，純由於本能的。

本能不能完成人格，很多地方我們闡揚過了。惟有智慧的文化發展，可以反本能。因此，文化的提高是首要的事。必要弄到大家澈底感悟到軍事之有害於人類，而人類之和平可以為友誼的外交行為來辦理，庶幾乎「人其人」了。

政治本是藝術的工作，尤其是外交，非有高深的藝術修養及藝術努力，不能壓抑本能而致力於藝術境界。

因之，外交便不止於是兩國的接觸而已，要由利害商討的接觸，而步入友情的和諧，方算是外交的成功。

要是外交只限於利害的商討而缺乏友情的和諧，這是普通外交的成功，維繫的方法便非常之困難。換言之，隨時可以破裂，有時，其破裂之危險，常超過無外交關係之上。

可是，目前的外交純是利害的，決無道義之可言，離友情之和諧還不知幾千萬里。這只是我們對於外交懸的理想目標而已。雖是理想，要是人類不共同向此方邁進，人類便只有毀滅，只有盡量利用我們的科學知識，盡量的製造軍火用以燬滅我們自己，終於為獸類所勦笑，因至毒如虎豹，並不殘殺同類有如人類。

既說外交是藝術的，則外交之運用，乃純屬藝術行為。可是這話說得太遠了，今天的外交，至多只能說到技術的。

所謂技術的，就是說只能在棋盤上為見子打子的應付工作，還說不上甚麼理想的計劃。換言之，在任何的曲解事實或敷衍事實的情況之下，只要能達到：（一）保護自己的存在；（二）確立自己的優越；（三）處理共通的利害問題；就夠了。

這種技術的外交行為，只能說是應付的外交，還說不上調適的互利互存的外交。比如在中國戰國之初，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只能派顏率往齊國運用外交的手腕把秦師退了。實際上，並不是澈底的辦法，設若齊國不肯出師，或齊國定要九鼎，再不然齊國因周之外交騙辭而激怒起來出了岔子，豈不大為糟糕？

不過一個弱國要生存，除了運用外交手腕又有什麼辦法呢？也許弱國最需要的還是外交。外交術的原則：第一、是能隨機應變；第二、是善於辭令；第三、是動以利害。這許多原則之運用，尤其弱國外交所最不可少的。

戰國時代蘇秦張儀之所以能縱橫逞能者，完全依據以上三個原則。不獨蘇張如此，在那時的外交，幾乎全是以權術為第一。毛遂，范雎，蘇澤等有名的權變外交家固不必說，即使是聖門之徒的子貢，也還是一個權術家。大家只知道子貢會經營商業，而不知其外交術並不弱於蘇張范蔡之流，據我看來，還勝過他們。太史公說：『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參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蘇張范蔡等外交術有時而盡，甚或如蘇秦還不得善終，其權術純為謀自己，結果何嘗謀了自己呢？反而害了自己。像子貢完全有目的計劃為弱國的魯，完成一個安全工作。這是弱國必要外交的實例。

比如此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方面，主要是英德的相持，張伯倫

不惜一再移尊就教於希特拉，商量歐洲的和平問題，這個外交進行終於被希特拉的鐵拳將張伯倫打倒了，甚至使英國陷於危急存亡之秋，英國的外交似乎完全失敗了。在邱吉爾上台的時候，正是英國最危險的時候，英倫三島似乎即將沒落，這時的英國當然是弱國了。弱國正需要外交，於是邱吉爾一方面把希特拉繼承人物赫斯，誘到蘇格蘭，布了一個疑陣；又將駐蘇大使召回來不給他轉去，以使各方面推測；議會質問又極含糊的答覆，說內容已通知美國。處處有暗雲，暗中竭力運用外交手腕，以啓蘇德之疑。因了這樣，蘇德兩方，忽由協定關係而大打特打起來了。英國始能由德國魔手之下鬆了一口氣，正如由鬼門開放還魂一樣，英國於是到了今天乃轉敗為勝，居然又趾高氣揚了。這皆是運用外交之功。

弱國是非靠外交不可的。歐洲的波蘭，亞洲的暹羅，都是運用國際均勢的外交苟且過活的。他如比利時瑞士等永久中立國家，也都離不了這個外交原則。中國在甲午戰役後，便有瓜分的危險，幸而有義國「門戶開放」的倡導，中國未亡。在第一次歐戰時，日本便想乘機併吞中國，好在九國公約限制任何國家不能獨霸太平洋，重行保護中國領土獨立，中國又算過了一次危險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便公開使用武力侵略中國，直到七七事變後，中國處境萬分困難，設若不是太平洋戰事起，中國已如何了實不可知。四強之說，我們固然很慚愧，但這個外交方式的展開，證明中國更不能不重視於外交。

今後的中國，一切固然都當積極進步，外交之重視尤為第一。前次開羅會議，今次舊金山會議，中國不僅被邀出席，而且地位主要，這當然是發揮外交技能的好機會，中國前途也必繫之於外交的運用方有新的希望。

中國外交的原則，我以為至少要注意幾點：第一、絕對避免陣綫外交與一元外交之呆板態度；第二、絕對注意地理之關係與遠交近和之策略；第三、絕對固定立國之立場與利害之選擇。外交是活用的不是理論的關爭；是實際的不是主義的號召；是相互的不是主義的侷

駭；若不明這些原則及遠大之認識，是不足語外交之行使。

四

中國自先秦以來，本來有一套外交技術之訓練；也可以說，中國人本長於外交。漢武帝時詔舉茂才異能以使絕國；清末徐桐、郭松濂、薛福成都是特別倡導外交之重要。雖有人認爲「安有正士，而屑爲此？」但外交之重要，要隨着國際交涉之複雜化，外交在國家政治上，仍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李鴻章之產生與此大有關係。在三國時代，如蜀費禕使吳，在外交上應該很特色。

此後世界應爲外交家的時代，尤其是中國外交家的訓練及鼓鑄應爲很切要的部門。他國外交家都是專門長期薰陶出來的，很少有臨時之派遣，大體都養之有素。如在英國，外交家不僅服務外交部，跟隨先輩外交家很久，而且大體上出之名門及伊頓中學及牛津大學，所以英國外交途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今天的艾登，即屬如此。而且鮑爾溫內閣時代，傾着全力以注意外交。當時外交部長實際上是兩個，形成兩種外交政策。一個是外相賀爾，一個是國聯事務大臣，即艾登。賀爾是外交界的斡輪老手，專做斡辭工作；青年艾登便作漂亮的噴香水器；全然是雙簧，於是英國在國際上乃進退自如，左右爲利。但此等外交家都不是突穎而出的，顯然有一個外交世家系統。

立足於今天國際舞台，於是就必然要以外交爲第一了。這是「天涯若比隣」的時代，外交家便應成爲政治之重心，凡政治人物也都必懂外交才有辦法。因此大批外交家之訓練乃極不可少，外交人才之修養就不得不特別注意。

第一、外交家應有廣博的智識，至少常識非充分不可。

第二、外交家必熟習國際大勢及本國歷史與文化。

第三、外交家必有隨機應變之才與清明在躬之素養。

第四、外交家必有遠大之眼光及冷靜之頭腦。

第五、外交家必有強健之體魄及堅忍之精神。

第六、要有公忠體國之主旨及爲公不顧私之熱忱。

關於這六點我們很有許多話說，很容易明白的地方，就不必說了。僅就最後兩點略予以解釋。外交家必有強健之體魄及堅忍之精神是二而一的。即是有健強之體魄方能堅忍；凡能堅忍的必有健強身體。過去如德之俾斯麥，法之克里孟梭，便是好例。與其說是外交勝利，不如說是他們身體之勝利。俾氏出席外交會議，不惜一再辯論，可以自朝至晚，面無倦容，大家作急時，他還是雍容自若，娓娓而談，鬧到談判激烈時，大家都憤而退席後，他還是照舊在座，吸煙消遣，以等他們氣平回席再談，每每弄得大家精疲力竭，折衷讓步後，他便勝利了。據說克里孟梭在英、美、德、意四強會議時，因懼消息透露，緊閉窗戶，因大家都在吸煙，便煙霧滿室，悶不可言，美總統威爾遜先生便首先支持不住，克氏則談笑自若，精神百倍。克氏活到八十多歲快要斷氣時，說不願有女性到他的跟前來哭，棺材要豎着葬，真所謂「虎死不倒榻」，無怪他有很大的功績。中國李鴻章也有此種優點。

第一次歐戰結束後，德國史特萊斯門，主張接收英法要求，參加國聯，以免法國藉口武力干涉。國人大譁，認爲屈辱。史氏說：「我離開日內瓦返國很容易，既受國人歡迎，又可減少處境之困苦羞辱，但於國家福利何？」那時只有德國文學家魯得威格說：「這才是政治家的風度，我們不過一熱頭腦而已。」德國之有後日，乃史氏爲公不爲私的熱忱所致。李鴻章也曾被國人罵爲賣國賊，但李氏究屬愛國不後於人的人物。

我們的外交家應特別傾聽我這個話，而今我希望大批新外交家之產生，中國便有無窮無盡之前途了。美總統羅斯福主張我們爲四強之一的原因，是說中國未來是強的。怎樣會強呢？我想，至少應有偉大之外交家出來，乃是強國要素之一。